

專輯論文

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台灣民眾新聞使用、媒介信任與倫理觀的關聯研究

徐孟延、蘇蘅

摘要

本文檢視多媒介環境下民眾的新聞倫理觀是否受到新媒介進入的影響而有不同，並探索哪些因素與民眾對新聞媒介的內容與記者採訪方式的倫理評斷有關，本研究試圖從民眾的新聞使用、媒介信任以及個人倫理觀等重要因素進一步觀察其間的關聯。研究發現，民眾對媒介內容的倫理評判，受其個人倫理觀影響甚鉅，較不會受到媒介暴露程度或信任程度左右。然而民眾對新聞採訪方式的倫理觀則較分歧，網路媒介的使用愈多者，對於新科技再現新聞事件的方式較具開放性；而電視新聞信任程度愈高者，則會傾向支持媒介組織的各種行事手段，無論在隱私、新聞置入或新聞再現方式皆對媒體較無批判力。整體研究結果顯示，多媒介環境下，現今新聞與媒介倫理觀是多元而複雜的，突破過往主要訴求新聞工作者專業倫理的意涵，而是一種專業倫理與民眾個人倫理交融的開放式媒介倫理觀。

關鍵詞：媒介倫理、多媒介環境、倫理、普世主義、相對主義、調查

徐孟延，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班研究生，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媒介全球化、新傳播科技與閱聽人研究。電郵：disleah@gmail.com

蘇蘅，台灣政治大學新聞學系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新科技與媒介轉型、傳播法規與倫理、傳播政策、新聞文化。電郵：herngsu@nccu.edu.tw

論文投稿日期：2013年5月31日。論文接受日期：2014年3月5日。

Special Issue Article

Ethics in a Multimedia Age: An Examination of News Exposure, Media Trust, and Personal Ethics in Taiwan

Meng-Yen HSU and Heng SU

Abstract

Media ethics is a subdivision of applied ethics. It deals with ethical principles and standards that are specific to the media. In a multimedia environment, the changing media landscape enables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o engage in discussions of media ethics.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ethical relativism and ethical universalism, the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news exposure and media trust are predictors of ethical perceptions. The research is also designed to explore five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is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media ethics? 2) How does new media exposure relate to perceptions of media ethics? 3) What factors influence attitudes towards ethical media content? 4) What factors influence attitudes toward contentious information gathering methods? 5) How do different ethical perspectives guide ethical decision making. A multi-stage systematic sampling technique was used to perform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s with 1,025 Taiwanese adults

Meng-Yen HSU (Ph.D. student).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Globalization, new media studies and audience.

Heng SU (Professor).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technology and media transition, communication law and ethics,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policy, news culture.

aged 20 and above in September 2010. The responses indicated that remaining neutral and objective were the two most important professional moral values among the related issues. When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rate the news sources they trusted the most, more than 50 percent chose the television news over other news sources. Most responses indicated that newspapers were the second most trusted source of news. The results showed no significant relation between the respondents' attitudes toward the ethics of media content, media exposure, and media trust. The heavy use of online news use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media trust and willingness to accept questionable information-gathering methods. To conclude, the article discusses how media developments encourage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journalism ethics to "new media ethics," in which ethics is the concern of all citizen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tudy are discussed,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future studies on media ethics are provided.

Keywords: media ethics, multimedia environment, ethics, idealism, relativism, survey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Hsu, M.-Y., & Su, H. (2015). Ethics in a multimedia age: An examination of news exposure, media trust, and personal ethics in Taiwa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33, 225–254.

鳴謝

本文為作者蘇蘅的台灣國科會計畫《媒介倫理在台灣：概念的的流變與跨文化適用》(NSC 98-2410-H-004-117-SS2)的部分研究結果，兩位作者在此感謝匿名評審的寶貴意見。

研究動機

1980年代發展迄今的網際網路，帶給傳播媒體劃時代的技術變革，並快速改變民眾的媒體使用行為，確立多媒介環境的產生；使得過往以產製者為中心的單向媒介內容傳遞方式，逐漸轉向雙向溝通形式(Boczkowski, 2010)。以往記者是無冕王，不只幫民眾定義何謂新聞，也擁有給民眾所需要的資訊的權力。然而在多媒介環境的脈絡下，人們增加了透過更多頻道與更多平台的選擇機會，其選擇媒介和新聞的自由度更高。現今新聞媒介在巨大的經營與生存壓力下，傾向採取市場導向產製新聞，以提供更吸引民眾的新聞作為產製主臬，新聞成為一種商品，一方面爭取更高的收視，另一方面將媒介內容和收視率一起賣給廣告主。在這種競逐收視率的過程中，民眾對新聞的態度卻產生轉變，原本傳遞資訊的媒介角色，似乎再難與追逐利益劃分清楚，民眾對媒介的信任感也逐漸消滅(Cooper, 2008; Harber, 2002)新聞媒介的倫理問題成為比過往更重要也更不能忽略的議題。

媒介倫理並不是一個新的學術議題，然而以前卻不如現今引起廣泛共鳴。從歷史發展軌跡和哲學用語來看，媒介倫理源於新聞倫理，然而卻有新的轉變，甚至被喻為「新聞倫理的第五次革命」(Ward, 2011, p. 213)，主要由於網路興起造成媒介形式快速更迭，印刷為主的平面媒體必須和以網相連的電子媒體相互融合，國外學者已把這種早年新聞專業和新媒體模式重新整合的新倫理觀稱為「混合媒介倫理」(mixed media ethics) (Ward, 2011, p. 214)，或者視為媒體工作新舊規範交錯期間的「開放式媒介倫理」(open media ethics) (Ward, 2010, p. 232; Ward & Wasserman, 2010)，認為倫理應從有侷限的、封閉的專業倫理，轉為與全體公民共同界定的倫理觀，已成為學術界刻不容緩的關注主題，主要因為數位媒介重新編織閱聽眾和新聞工作者的關係，使外界對工作流程的參與更趨緊密，媒介倫理已是多層面多指標的複雜議題，民眾對新媒體的功能有不同期待。

台灣傳播學界過往的倫理研究多半側重新聞產製端的討論，對於數位時代的媒介倫理討論較少(林照真, 2005; 許瓊文, 2009)。然而本研究認為，在多媒介環境以及媒體產製市場導向的脈絡下，民眾對

於新聞內容、產製的態度以及倫理概念，可能影響民眾的收視偏好，進而促使影響媒介產製新聞的作法，形成一種循環。學者也抱持類似看法。Rao和Wasserman (2007)指出，Siebert等學者於1974年提出四種報業模式(“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model)，即代表社會如何看待報業的功能，西方強調的倫理固然是一種新聞專業和新聞機構遵循的倫理架構，然而民眾怎麼看媒體採用倫理的原則也非常重要，因為媒介轉型也出現倫理新挑戰，究竟這些倫理觀是延續過往、或取代、或創新，都將影響未來媒介走向。

美國學者Cooper (2008)比較近幾十年來美國民眾的倫理觀與其變化，發現美國倫理議題不但與傳播科技變化有關，甚至也出現在消費者和非關倫理的關切議題中，多數調查關切的媒介倫理議題包括說出現實、侵犯隱私、和過多的內容(例如太多暴力、色情和犯罪內容)(Cooper, 2008, p. 18)。Cooper (2008)因而指出，新聞倫理和專業的概念已經不斷延伸，「專業」領域已包括在實境電視或小報媒體的工作者、為大公司機構做事的公關人員，以及幫娛樂產業開發各種商業多元產品的從業人員，這些廣義的「媒體」「專業」出現，使得古典倫理議題產生舊酒裝新瓶的新樣貌，美國民眾亦能感受科技環境與時俱進，他們與媒體的關係也在改變。

台灣傳媒除了受到新科技的重大影響，出現如前述新聞專業人員與民眾的角色相互影響以外，諸如新科技對個人隱私的介入、對「真實」的界定與再現、全球化的媒介景觀轉變以及市場競爭也都受之影響。

除了新科技與媒介轉型的影響之外，根據國外相關文獻(Christians, 2005; Plaisance, 2007)指出，雖然媒介倫理是民眾極為關注的議題，但是人們對待倫理的看法卻因為個人本身所持倫理觀的不同，可能衍生後續倫理價值判斷的差異。余英時雖然從歷史角度探討儒家觀點的「道德規範」，認為儒家是從純為個人道德規範的事情發展到「德性之知」和「聞見之知」，他指出儒家認為倫理是一種「切己體驗」，且「切己體驗」包含個人道德性的「前理解」(余英時，2008：95)；余英時的看法和國外學者從西方倫理哲學從個人倫理觀出發的看法不謀而合，即個人倫理觀往往是扮演人們對於某些事情進行道德判斷的重要依據，但是個人對新聞媒介表現的倫理判斷，又和情境與事件特質有關，西方學者

進一步分為因地制宜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和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主義」(universalism) (Christians, 2005)，並認為個人倫理觀屬於普世主義或相對主義將影響人們的道德判斷與實際實踐 (Christians, 2005, 2008; Wilkins, 2010)。

因此表現相當多元的台灣媒體產業也會訂定各自認為應該遵循的倫理準則，並呈現對媒介表現不盡相同的倫理標準；然而學界卻很少探尋不同媒體對當下倫理議題是否有共識，更少論及從業人員如何在日常工作中在新挑戰做決策，也不清楚民眾在現今多媒介環境下，是否因為在不同媒介的暴露時間、對不同媒體的不同信任偏好，以及個人的倫理觀是否造成其對媒介內容與新聞採訪不同的倫理評價。因此本研究將從媒介使用、媒介信任偏好和個人倫理觀一併探究，試圖分析民眾對於新聞內容以及新聞採訪方式的價值判斷，究竟是否是受到新媒介使用的影響，又或是個人本身的倫理觀所左右。若是民眾受到新媒介使用的影響，那麼，在新媒介與新聞交互衝擊轉型之際，民眾對新聞內容與再現方式的倫理道德判斷更趨寬鬆或緊縮？若民眾並非受到媒介使用的影響，那麼是怎麼樣的個人倫理觀會讓人們做出某種道德判斷？媒介環境的力量、責任與倫理標準的制定與執行皆可能在這份研究顯露端倪。

文獻探討

多媒介環境與倫理觀

新科技使得現今的媒介環境日益豐富且多元，網路技術更是使民眾的傳播工具日新月異且更加個人化，無論是手機、私人部落格都能夠使人方便搜尋資料以及分享資訊，民眾在新媒介環境下，不只是新聞內容的接收者，也同時是產製者。Bivins (2004) 和 Ward (2010) 針對各種媒體滙流融合的現象，以及衍生的倫理改變進行討論。Ward (2010) 認為，過往的媒介倫理無法適用於現今社會，因此提出了「開放式媒介倫理」。Ward 指出，過往對倫理的定義是侷限於新聞工作者本身的專業倫理，現在則是擴及到全民在媒介融合、多媒介時代如何看待

新聞，已經改變了傳統界定的「新聞」及其倫理。Ward (2010) 更指出，「開放倫理觀」不僅代表新聞工作已經進入新模式，也因為工作過程加入更多參與者的對話而向新的體驗開放，不再只是新聞工作者或專業機構的倫理觀。

例如Deuze和Yeshua (2001) 的研究指出，網路媒介的確使得新聞倫理的內涵產生意義上的轉變，例如「商業置入」界線就變得模糊難以界定，比方說網友常分享、褒揚或批評某些商品，使得商業廣告、商業置入與網友自發的分享心得內容產生混淆。或者，由於網路新聞講求速度快，因此常常會有「正確性」的疑慮或缺少查證的情形。根據Cooper (2008) 對美國從1986年到2006年的美國民調機構對民眾對媒介倫理民意結果的分析，民眾關切的媒介倫理議題已經從單一媒介（如報紙、廣播、電視）的倫理，發展到整體媒介產業（新聞、娛樂、廣告）的倫理文化；傳統媒介與網路媒介的傳播模式差異，造成媒體使用情境脈絡的不同，以往人們覺得嚴重的議題，現在人們不一定覺得嚴重，以往人們重視的媒介特質，現今人們或許已不再將之奉為圭臬（Cooper, 2008）。

相對於Bivins (2004) 和Ward (2010) 提出的開放式媒介倫理觀，傳統的專業媒介倫理則被Ward和Wasserman (2010) 形容為是封閉式媒介倫理 (closed media ethics)，對象是專門的新聞從業人員，由這一小群人界定媒介倫理界線，以及訂定準則與依歸，也由這群人批判何謂倫理，然而多媒介環境使民眾參與新聞的機會大為提高，這一小群人的專業倫理逐漸無法控制大多數人，因此重新思考新時代的開放式倫理觀的定義與概念是十分重要的，但過往的研究少有對此進行探究。Ward和Wasserman (2010) 認為多媒介環境下的倫理觀，必須要連結記者和民眾，了解各方對倫理的思考是否有落差，以及互相理解對方對倫理的想像與立場，並且應有詮釋倫理意涵的平等權力。多媒介環境的背景，使得許多研究者紛紛將倫理的關懷視角從原本的專業工作者轉向一般民眾 (Spence & Quinn, 2008)。

另也有研究者承繼Habermas (1990) 和Gadamer (1996) 的理論基礎指出，以往的媒介倫理觀流於「獨白」，也就是少有對話，因此主張媒介的倫理觀應當能夠受到民眾檢驗，以及互相檢視與討論，找到更好

的作法，也就是所謂的論述倫理(discourse ethics)(Glasser & Ettema, 2008)。不過Habermas的想法也被認為太過理想化，畢竟民眾確實難以實際影響主流媒體的編輯權，因此民眾仍然必須透過網路個人媒介平台反映自我的主張與意見(Cenite & Zhang, 2011)。

如同上述我們不難發現，多媒介環境使得新聞媒介倫理的內涵逐漸轉變，新的媒介倫理思維更為開放而龐雜，然而專業倫理根深蒂固的形象仍舊存在，即使新型態的媒介已然改變民眾對媒體的某些想法，但新概念遇上舊思維，仍然可能產生某些適切或不適的結果。事實上，媒介倫理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概念，多媒介環境的產生縱使讓媒介倫理有了轉向，但媒介倫理內涵早已不斷更迭變動。

新聞倫理內容變遷與民眾信任感的下滑

一般認為新聞專業倫理這個概念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伴隨進步主義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同步出現，當時新聞媒介多被賦予公民責任與義務，擔負重建社會的重要角色，其倫理準則也在當時逐漸發軔(White, 1995, p. 442)，時至今日，對於新聞倫理的概念，可以從理論、真實建構以及社會哲學等各種面向討論之。1980年隨着各種專業倫理概念的快速成長，學院也不斷豐富新聞媒介應然的倫理觀(Christians, 2005, p. 181)¹。隨着時代變遷，不同的時期也有不同的關注焦點，各種研究除了以新聞工作者為對象之外，最重要的還是大規模調查民眾對於新聞媒介的看法與態度，並對當時的新聞媒介進行反思。例如1986年便開始有以「媒介倫理」為主題，對全美民眾進行調查，當時媒介倫理主要關心民眾對隱私、報導偏差、監管以及暴力進行調查，這些項目包括不當內容、對閱聽眾的效果層次，真實再現以及言論自由的層次(Cooper, 2008)。

隨着有線電視系統擴張迅速，媒介內容氾濫龐雜，民眾認為1990年代的媒介充斥更多暴力和性內容，有些節目甚至內容乏善可陳，不知所云(Cooper, 2008)。除了傳統媒介以外，網路媒介的倫理也在當時受到注意，民眾對於這項新媒介的關注重點仍然放在色情內容、兒童保護，另外諸如網路時代隱私控管的問題也被提出，新科技使得造假

欺騙更加容易也讓民眾憂心忡忡 (Greenberg Quinlan Rosner Research, 2000)。

儘管國外學者對於媒介轉變下的新倫理觀提出很多解釋，但可以綜整出兩種類型，第一種是對媒介本質的倫理觀，即美國民眾最關注的是媒介內容是否適當，關注的議題是性與暴力這類攸關基本良善倫理價值的問題；第二種是媒介產業環境的倫理觀，網路的出現開始讓民眾重視關於媒介本質與自身的關係，例如隱私與造假欺騙，這種類似新科技倫理意識的啟蒙，隨着後續媒體形式的多元，而讓更多不同的倫理議題受到關注。民眾對於新聞媒介愈感到質疑，伴隨而來的便是民眾對媒體本身愈喪失信心，後者更折射出民眾對外在改變出現的媒介危機與倫理危機的深化 (Cooper, 2008; Christians, 2005, 2008)。

美國報紙編輯協會 (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 簡稱 ASNE) 發現，民眾對報紙新聞內容的信心下滑嚴重，而使得信心下滑的原因都跟倫理有密切關係，包括媒體有太多煽情和虛矯的新聞、報導偏差無平衡報導、不正確或不說真相、粗暴侵犯他人隱私、過分負面以及不關注民眾想要知道的議題 (Lambeth, 1998)。台灣「中華民國群我倫理促進會」於 2013 年公布最新的《社會信任調查》發現，民眾對「新聞記者」的不信任感從 2002 年 53.8% 上升到 2013 年的 58.6%。民眾對報紙新聞信任和不信任的比率在 2001 年至 2013 年保持穩定，但是對電視新聞的信任度從 2001 年的 62.9% 降到 2013 年的 44.6%，不信任度從 25.5% (2001 年) 升至 45.1% (2013 年) (《遠見雜誌》，2013 年 7 月號)。

另一方面，媒介讓民眾了解更多資訊的同時，民眾也可能對媒體產生反身性思考，包括民眾認為媒體的政治報導有偏差，媒介為了生存不再以公民責任為己任，而是競相追逐收視率與市場利益，接受商業賄賂為某些特定企業說好話，或是接受企業花錢購買節目置入特定內容 (Cooper, 2008; Forst, 2000; Good, 2003)；又或觀眾接收不平衡的報導以及不真實的節目，形同受到媒體操弄，對媒體的信任也會隨之瓦解。換言之，民眾對媒體確實有一套倫理準則，然而這條準則的基準線卻會隨着時代不同而有所改變。雖然倫理規範是自願性的工作準則，但不表示民眾認為工作者可以自由放任、無所遵循 (Richard, 2009; Wilkins & Christians, 2009)；研究更發現民眾看媒體工作者和媒體工作

者自己看自己並不相同，半數民眾認為媒體並未履行憲法賦予他們應盡的責任，42%民眾認為媒體刊播已經太過恣意氾濫(Paulson, 2002)。

由此可知，民眾對媒介倫理的認知，已對新聞人員過度追求自主而能否踐行公共服務的責任形成重大挑戰。從縱向出發，人們對媒介倫理的關懷內容是隨着時間改變的，從深度着眼，人們對媒介的倫理準則是多層次的，不只侷限於文本內容，同時也關注形而上的問題，而民眾的倫理觀也深深影響其對媒體的信任感。過往台灣甚少研究從民眾的角度出發進行大規模相關調查，本研究認為，既然從西方文獻可以發現民眾對媒介與新聞的倫理觀是隨着脈絡流動的，那麼台灣本地或許也可能有獨特的在地倫理解讀現象，台灣民眾如何受到新聞媒介暴露的因素，而影響其對新聞媒介的看法與態度，將是應當進一步追蹤探究的主題。

個人倫理觀與新聞倫理

人們對新聞倫理的關注持續達一個多世紀之久，大環境對倫理內容雖然會隨時間遞嬗而轉變，但微觀而論，由於倫理並不具有客觀且固定的標準，因此每個人對新聞媒介的倫理尺度可能不盡相同。Hindery (2005) 指出，今昔媒介倫理探討主題除了媒介、相關議題，就連閱聽眾個人對倫理的態度也不盡相同。Christians 等(2001)彙整過往對倫理的討論，指出新聞倫理推理過程所要考慮的要件，包含對倫理的定義、價值觀、原則以及忠誠，Christians (2005, 2008) 並進一步指出，對新聞倫理的判斷，攸關對新聞論述方式的理解與道德考量，但也進入政治哲學與公共溝通的領域，因此，長期的邏輯思維與判斷體系是重要的評價依歸。對於新聞與媒介的倫理觀，Christians (2008) 認為基本上可以分為強調社群多元文化的「相對主義」思維，與強調基本普世倫理道德原型的「普世主義」或「絕對主義」(Christians, 2008)。

個人究竟從普世主義或相對主義來思考如何解決倫理問題，將影響個人對外倫理難題的判斷，由於每個人信念不一，如果相信相對主義的倫理觀，便容易傾向做非倫理的選擇，反之普世主義者對於責任的信念愈強，愈不願意採取非倫理的選擇。採取普世主義看法的學

者如新聞學者 Curran (2005) 從媒體在民主社會的角色與功能，或 John Keane (2005, p. 106) 從全球政治體制浮現公民社會的概念探討媒介倫理，他們均主張存在一種全球共同遵循的社會秩序，屬於民主新聞學的核心價值；而 Lambeth (1998, 2000) 和 Sissela Bok (1995) 兩位重要學者亦以共同利益或共同價值稱之，認為倫理存在着普世的基本共同價值就是對共同良善的追求，這也是普世主義者認為應該重視個人實踐倫理的義務，希望對「結果」採取「對」的行動，因此普世主義倫理通常偏重結果取向，也重視要創造更多的良善結果 (Plaisance, et al., 2012)。

「相對主義」思維則重視倫理爭議發生的情境脈絡，認為不同的文化、族群與社會可能對某種事情持有不同的看法，對於好與壞是程度差別，「相對主義」的倫理標準會適時調整，倫理也是因時因地受文化內在情境制約，就像 Elliott (1988, 2007) 主張倫理雖然是分享的價值，但分享目的在於產生共識 (Christians, 2008)。但如何對倫理帶來的利益進行判斷，從多元社會角度很難有共識，因此只能追求社會最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結果是否最適合多數來看。尤其傳播不只是一種訓練，更是一個社會各種力量的整合，因此相對主義就是符合不同社群的需求做道德判斷 (Christians, 2005)。

反之，「普世主義」強調倫理有其最低限度，宛如一把尺，一旦逾越，便形同失去道德規範。普世主義也強調媒介要做的是長久對社群有意義有益的事，而不僅是日常工作的每天實作。因此倫理判斷會同時兼具利他 (altruistic) 和自我主義的考量 (Merrill, 1996)。

從實務面來看，Wilkins (2010) 提到專業的實務守則不斷增加，環境和媒體交互激盪下產生更多的責任與義務，義務論嚴格的倫理道德確實提供實務界指引方針，國外媒體倫理研究的發展，不但圍繞在「倫理」概念的探討，更重視倫理在新聞實務的實踐，但是新聞倫理不能顧及到所有的可能性與複雜的個案，Callahan (2003) 主張對倫理觀的思考應該回到基本面，即哪些原則真正規範了新聞標準以及新聞工作者報導時的心理狀態與決定 (p. 3)；Elliott (1986)、Larson (1977) 和 Cooper (2008) 把新聞倫理規範的實務面分為採訪手段與內容呈現，但兩者又和工作人員偏重目的論的組織思維或義務/責任論專業思維有關。Yao 和 Eigenmann (2013) 研究倫理和災難新聞報導的關係發現，工作者愈重視

責任倫理，愈會發揮看門狗的守望角色；但如果是愈忠於所屬媒體，就無法有效抗壓，報導會以媒體組織利益作為優先決定，代表的是媒體所有權人或管理階層的倫理思維。兩者的倫理推理和思考過程並不相同。因此本研究希望透過對個人倫理觀的探究，更進一步了解台灣民眾的倫理觀和媒介倫理觀有何關聯，特別在媒介內容倫理與新聞採訪倫理上會產生甚麼影響，因此：

根據上述，本研究主要研究問題如下：

- 研究問題一：多媒介環境下，民眾的媒介倫理觀有何特色？
- 研究問題二：新媒介的使用是否會影響民眾的倫理觀？
- 研究問題三：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對媒介內容倫理的看法？
- 研究問題四：哪些因素會影響民眾對新聞採訪倫理的態度？
- 研究問題五：民眾的個人倫理觀和其媒介倫理觀有何關聯？

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

為了大規模掌握全台灣民眾對媒介信任與新聞倫理的想法，本研究使用調查法，並以電話訪問的方式訪問全台民眾，且由於本研究試圖探索民眾的倫理觀，因此將受訪對象設定為自我倫理態度與心智觀念發展較為成熟的成年人(年滿20歲者)。

本研究委託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執行，抽樣方法為電話簿抽樣法，以「中華電信住宅部98-99(2009-2010)年版電話號碼簿」為母體清冊，依據各縣市電話簿所刊電話數佔台灣地區所刊電話總數比例，決定各縣市抽出之電話個數。先以等距抽樣法抽出各縣市電話樣本後，為求完整的涵蓋性，再隨機修正最後二碼及四碼，以求接觸到未登錄電話的住宅戶。電話接通後再由訪員按照戶中抽樣的原則，抽出應受訪的對象進行訪問。受訪樣本為獨立樣本。

正式施測期間為2010年9月23日(星期四)至同年9月26日(星期

日)共執行四天,在施測前(9月21日)進行一次前測,主要在與政大選舉研究中心就前測中問項陳述與定義不清楚處再作討論修改,經過整體確認訪問問題項設計意旨以及訪員施測與說明方式後,便進行正式施測。本次研究成功訪問1,025人,以95%之信心水準估計,最大可能隨機抽樣誤差為 $\pm 3.06\%$ 。

變項操作

以下說明本研究重要探索概念,包括媒介新聞使用、媒介新聞信任、民眾個人倫理觀、民眾的媒介內容倫理觀以及民眾的新聞採訪倫理觀等幾項操作方式。

I. 媒介新聞使用

本概念將從電視、報紙以及網路新聞媒體分別探究,廣播新聞未列入是由於廣播新聞使用人數非常少,無收聽習慣者超過6成,因此不列入討論。新傳播科技的出現是否影響年輕人的閱報頻率,過去的研究也尚無定論。Atkin (1994) 和 Brooks 和 Kropp (1994) 的研究發現媒介暴露主要即使用時間,且中央研究院社會變遷調查大眾傳播組的問卷,在1998、2003、2008年均使用以下方式詢問受訪者,故題項設計如下,電視新聞使用以「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多久的電視新聞?」詢問,有效回應中,平均數達3.80,顯示平均收視時間為30-59分鐘,標準差1.60。報紙新聞使用以「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多久的報紙?」詢問,有效回應中,平均數為1.44,平均閱讀時間不到半小時,標準差1.76。網路新聞使用以「請問您每天平均看多久的網路新聞?」詢問,有效回應中,平均數為1.33,顯示平均瀏覽時間低於29分鐘,標準差1.74。本題項後續作為連續變項操作,數值愈高代表在該使用媒介的時間愈多。

II. 媒介新聞信任

民眾的媒介新聞信任採用Cooper (2008) 研究的詢問方式,並分別從電視、報紙以及網路新聞信任程度進行探究,電視新聞信任以「請問您相不相信『電視』新聞?」詢問,有效回應中,得到平均數為2.70,介

於不相信與相信之間(非常相信4分,相信3分,不相信2分,非常不相信1分),標準差0.60。報紙新聞信任以「請問您相不相信『報紙』新聞?」詢問,有效回應中,得到平均數為2.60,介於不相信與相信之間,標準差0.64。民眾對電視新聞的信任最高,但報紙僅比電視略低一點。網路新聞信任落後於電視和報紙新聞之後,研究詢問「請問您相不相信『網路』新聞?」,有效回應中,得到平均數為2.52,介於不相信與相信之間,標準差0.64。本題項答案為Likert四點量表,後續視作連續變項操作,數值愈高代表愈相信,反之則為愈不相信。

III. 民眾個人倫理觀

根據文獻(Patterson & Wilkins, 2004; Christians, 2005, 2008),民眾的個人倫理觀可分做普世倫理觀以及相對倫理觀,本研究針對兩種倫理觀皆分別設計兩題項檢測,普世倫理觀以「有人說:『人們絕對不能做出任何傷害他人尊嚴或權益的行為』,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和「有人說:『人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說謊』,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判定,然而實際施測結果卻與過往西方文獻有所出入,兩題項信度Cronbach' alpha達.098。研究者認為,會出現與過往文獻的重大差異,可能是因為兩者題目陳述有程度上的差異,而這種差異或許對華人的意義與對西方民眾不同。例如民眾可能因為認為「傷害他人尊嚴或權益」明顯較「說謊」更為嚴重,且台灣俗諺常講「善意的謊言」,因此說謊往往也被認為有可能是善意或不使人難堪的作法,因此有較多的詮釋空間。因此在絕對倫理觀上,本研究將普世倫理兩題項分別列為單獨的變項,並命名為「普世倫理1」(受訪者回答同不同意「有人說人們絕對不能做出任何傷害他人尊嚴或權益的行為」,平均數3.47,標準差0.76)以及「普世倫理2」(問受訪者同不同意「有人說,人們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說謊」,平均數2.53,標準差0.91),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作為操作的題項。本題項為順序尺度視作連續變項操作,數值愈高代表普世倫理程度愈高。

在相對倫理觀上,本研究根據文獻,以「有人說:『如果行為能帶來利益,雖然可能傷害他人,仍然可以去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以及「有人說:『倫理因人而異,沒有一套固定的標準』,請問您

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兩題項進行施測，不過兩者的Cronbach's alpha也只達.211。為顧及研究嚴謹性，本研究並不把強行將兩題相對倫理題項合併，而是分開處理，並將之標示為「相對倫理1」（代表「有人說：『如果行為能帶來利益，雖然可能傷害他人，仍然可以去做』，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平均數=1.44，介於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之間，標準差=.66）與「相對倫理2」（「有人說：『倫理因人而異，沒有一套固定的標準』，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平均數=2.28，介於不同意與同意之間，標準差=1.02）作為不同變項。兩題項為順序尺度視作連續變項操作，數值愈高代表相對倫理程度愈高。

1. 民眾的媒介內容倫理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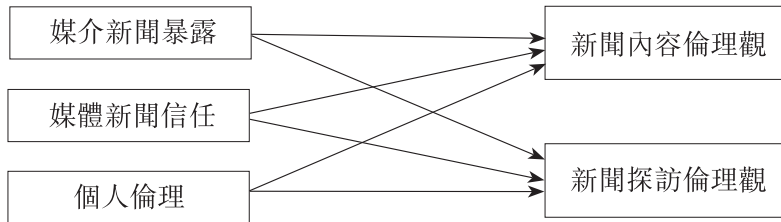
本研究使用四題項檢測民眾的媒介內容倫理觀，分別是「請問您不同意『新聞有性犯罪的詳細內容』？」（平均數=1.85，尺度分別為非常相信4分，相信3分，不相信2分，非常不相信1分，因此本題介於非常不同意與不同意之間，標準差=.91）、「請問您同不同意『新聞用很多女性裸露的鏡頭或畫面』？」（平均數=1.50，標準差=.69），「請問您同不同意『新聞有暴力犯罪的詳細內容』？」（平均數=1.77，標準差=.90）以及「請問您同不同意『新聞報導很多名人的私生活』？」（平均數=1.85，標準差=.84），這四題Cronbach's alpha為.7，信度高，因此合併測定民眾對媒介內容的倫理觀，數值愈高代表媒介內容倫理觀愈寬鬆，反之，數值愈低代表受訪者的媒介內容倫理觀愈嚴謹。

2. 民眾的新聞採訪倫理觀

針對民眾的新聞採訪倫理觀，本研究依據過往文獻以及考量現今媒介環境特殊性，以六題項測定，分別是「請問您同不同意『新聞用電腦動畫的方式來模擬事件發生經過』？」（平均數=2.28，介於不同意與同意之間，標準差=.99）、「請問您同不同意『新聞用真人演出事件發生經過』？」（平均數=1.86，標準差=.80）、「請問您同不同意『政府花錢去請記者來採訪新聞』？」（平均數=1.80，標準差=.84）、「請問您同不同意『企業花錢去請記者來採訪新聞』？」（平均數=2.15，標準差=.88）、「請問您同不同意『記者使用隱藏式麥克風或攝影機採訪新聞』？」（平均數

=1.70，標準差=.79)以及「請問您同不同意『記者為了採訪需要，可以未經過他人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資料或照片』?」(平均數=1.33，標準差=.56)，這六題Cronbach's alpha=.6，可以接受，因此合併測定民眾的新聞採訪倫理觀。數值愈高代表受訪者的新聞採訪倫理觀愈寬鬆；反之，數值愈低代表新聞採訪倫理觀愈嚴謹。

圖一：本研究基本架構



人口變項

本研究將人口變項視為自變項，並非主要探究目的，在人口變項中，控制受訪者性別、年齡與教育程度。性別為名目變項，進行虛擬變項處理。數值0為男性，1為女性。年齡在施測時，以「請問您是(民國)哪一年出生的」為題，後續研究者以99(調查施測年)-該答案，得出受訪者當年年齡。教育程度為順序尺度視為連續變項處理，數值愈大代表教育程度愈高。

資料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樣本結構男性佔49.8%，女性50.2%。20-29歲者佔19.6%，30-39歲者佔20.9%，40-49歲者佔20.8%，50-59歲者佔18.0%，60歲以上佔18.6%。教育程度分布小學及以下佔18.7%，國、初中佔14.1%，高中職29.3%，專科13.3%，大學及以上24.3%。

根據資料分析可以發現，多媒介環境下民眾的媒體倫理觀較為多元，他們未必受到人口變項而有絕對的影響，許多普世價值的問題如「媒體拿了誰的錢，就該幫誰說話？」不分性別都有86%的不贊同，或

如「媒體在監督政策的政策或施政，你覺得重不重要？」不分性別也都有超過85%的贊同。研究發現，影響民眾倫理觀判斷的因素，除了對新聞媒體的信任程度之外，個人倫理的傾向也會影響他們對於媒介操作是否符合倫理的評斷。換言之，研究問題一所關心的，多媒介環境下，民眾倫理觀的特色，從整體研究結果來說，本研究發現，在多媒介時代裏，民眾的媒介倫理觀不是一種外在客觀條件下必然的產物，不是用性別決定，也非受教育程度而有絕對的影響。民眾對媒介角色以對各政黨保持中立最為重視(平均數=3.60，標準差=.63)，其次是監督政府施政(平均數=3.40，標準差=.73)，再次為增進民眾生活知識(平均數=3.31，標準差=.69)，以及快速取得並傳遞資訊給民眾(平均數=3.24，標準差=.70)，整體偏向為公益和第四權的角色。

然而，民眾對於媒介表現的倫理觀像是民眾內心的一把尺，受到個人對事件的詮釋而有不同解讀，而這把尺就是個人的倫理觀。細節本研究將以迴歸分析對應研究問題二三四五進行分析。

對照本研究架構與對應研究問題二和三，研究者首先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將民眾的媒介新聞暴露時間、媒體新聞信任以及個人倫理觀與受訪者的新聞內容倫理觀和新聞採訪倫理觀進行階層迴歸分析，得到表一與表二。以下分從表一與表二結果進行說明。

媒介內容倫理觀的預測

從表一可以發現，人口變項的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都對預測民眾媒體內容倫理觀有顯著影響。男性顯著較女性對媒體內容倫理觀呈寬鬆($\beta = -.14$)，年齡愈輕愈寬鬆($\beta = -.19$)，教育程度愈低也愈寬鬆($\beta = -.12$)，從標準化係數可以看出，年齡對媒體內容倫理觀的影響較其他兩者為大。

其次，模式二和模式三的模型未達顯著，也就是模型二和模型三的解釋力上升幅度未達顯著水準，亦即無法拒絕模型一和模型二、三有差距。但雖然未達顯著，我們卻可以發現，在加入媒體使用與媒介信任之後，人口變項的係數都減弱，可以發現加入新的變項後，雖然整體模型影響力並不顯著，但確實發生影響。

模式四的模型及解釋力上升皆達顯著，人口變項的性別、年齡以及教育程度雖仍然顯著，然而係數卻發生變化，在加入個人倫理四組變項後，性別的係數沒有改變 ($\beta = -.14$)，但是在模式一中人口變項裏影響最大的年齡，其係數卻減少 ($\beta = -.13$)，教育程度則仍然是三者中較低的 ($\beta = -.10$)。而絕對倫理1 ($\beta = -.97$)和相對倫理1 ($\beta = .13$)也能顯著預測民眾對媒體內容的倫理觀。相對倫理2雖然未達顯著，但很接近顯著 ($\alpha = .09$)，係數也為正 ($\beta = .07$)，表示有正向關係。整體而言，絕對倫理愈低，對媒體內容倫理愈寬鬆，而相對倫理愈高者，對媒體內容倫理則愈寬鬆。

表一 新聞使用、媒介信任對媒介內容倫理觀迴歸分析(樣本數=1,025)

| 研究變項 | 模式1 | 模式2 | 模式3 | 模式4 |
|-------------|---------|---------|--------|---------|
| 控制變數 | 係數 | 係數 | 係數 | 係數 |
| 性別 | -.14** | -.14** | -.14** | -.14*** |
| 年齡 | -.19*** | -.18*** | -.17** | -.13** |
| 教育程度 | -.12** | -.012* | -.12* | -.10* |
| 媒介新聞使用 | | | | |
| 電視新聞使用 | | .02 | .01 | .02 |
| 報紙新聞使用 | | -.07 | -.06 | -.07 |
| 網路新聞使用 | | .01 | .01 | .01 |
| 媒介信任 | | | | |
| 電視新聞信任 | | | .04 | .06 |
| 報紙新聞信任 | | | -.03 | -.05 |
| 網路新聞信任 | | | .04 | .04 |
| 個人倫理 | | | | |
| 普世倫理1 | | | | -.10* |
| 普世倫理2 | | | | .01 |
| 相對倫理1 | | | | .13** |
| 相對倫理2 | | | | .07 |
| 樣本數 | 1025 | 1025 | 1025 | 1025 |
| 調整過後的 R^2 | .04 | .04 | .04 | .07 |

| 研究變項 | 模式1 | 模式2 | 模式3 | 模式4 |
|------|---------------------|---------------------|---------------------|---------------------|
| SEE | .61 | .61 | .61 | .60 |
| F值 | 9.58 ^{***} | 5.14 ^{***} | 3.61 ^{***} | 4.45 ^{***} |

說明：*** 顯著性表示 $p < .001$ ，** 顯著性表示 $p < .01$ ，* 顯著性表示 $p < .05$

新聞採訪倫理觀的預測

根據表二可以發現，人口變項的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都對預測民眾對記者採訪倫理觀有顯著影響。男性顯著較女性對媒體內容倫理觀呈寬鬆 ($\beta = -.11$)，年齡愈輕愈寬鬆 ($\beta = -.22$)，教育程度愈低也愈寬鬆 ($\beta = -.11$)，從標準化係數可以看出，年齡對記者採訪倫理觀的影響較其他兩者為大。

模式二未達顯著，表示增加媒介新聞使用這個變項所提升的解釋力無法被驗證和模式一有顯著不同，然而在加入媒介新聞信任變項後，模式三達顯著，也就是說媒介新聞信任是使整體模型解釋力提升的重要變項。從模型三可看出，除了人口變項的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仍有顯著影響外，電視新聞信任度也可以預測民眾對記者採訪的倫理觀。電視新聞信任係數 $\beta = .12$ ， $\alpha = .05$ ，也就是說，愈信任電視新聞的人，對記者採訪的倫理觀愈寬鬆。當電視新聞信任這個變項加入後，我們可以發現人口變項的係數值也發生改變，性別和教育程度的係數值絕對值都下降，顯示對依變項的影響力減弱，唯有教育程度的係數絕對值上升 ($|\beta = -0.11|$ 轉變為 $|\beta = -0.14|$)，影響力增強，但是方向性為負，也就是說，在電視新聞信任度這個變項出現後，教育程度愈突顯出其負向影響力。

在加入個人倫理觀後，模式四的模型F增量達顯著，換言之，模型四較模型三更貼近解釋模型。人口變項的性別、年齡以及教育程度仍然顯著，不過此時網路新聞使用也變得顯著 ($\beta = .09$)，亦即使用網路新聞時間愈多者，顯著對記者採訪倫理觀愈寬鬆，電視新聞信任也仍是顯著變項。至於個人倫理觀部分，普世倫理1 ($\beta = -.15$)、相對倫理1 ($\beta = .26$)、相對倫理2 ($\beta = .08$) 三者皆顯著，可以發現絕對倫理愈低

者，對記者採訪倫理觀愈寬鬆，而相對倫理愈高者，也對記者採訪倫理觀愈寬鬆。

整體而言，從表一和表二的結果可以發現，除了人口變項之外，民眾的個人倫理觀確實會對他們的媒介內容倫理觀以及新聞採訪倫理觀的看法有所影響，且無論是絕對倫理或相對倫理都具有一定的影響力，特別是個人倫理觀幾乎是除了人口變項之外，影響民眾對媒介內容倫理看法最重要的因素，無論新聞使用時間如何或是媒介信任程度高低，都無法影響個人的倫理觀對新聞內容倫理的態度。而民眾對於新聞採訪的倫理觀，除了與個人倫理觀有影響外，網路新聞使用時間以及電視新聞信任也都影響其態度。有鑑於以上透過迴歸分析的發現，研究者認為，我們必須更進一步探索，究竟個人倫理觀會影響民眾對於哪些內容倫理以及採訪倫理的看法(亦即對應研究問題四和五)，以及網路新聞使用時間與電視新聞信任，會如何影響民眾對媒介內容倫理與新聞採訪倫理的看法。

表二 新聞使用、媒介信任與個人倫理對新聞採訪倫理觀迴歸分析(樣本數=1,025)

| | 模式1 | 模式2 | 模式3 | 模式4 |
|--------|---------|---------|---------|--------|
| 控制變數 | 係數 | 係數 | 係數 | 係數 |
| 性別 | -.11** | -.10* | -.10* | -.11** |
| 年齡 | -.21*** | -.19*** | -.18*** | -.13** |
| 教育程度 | -.11* | -.13** | -.14** | -.12* |
| 新聞使用 | | | | |
| 電視新聞使用 | | -.03 | -.05 | -.04 |
| 報紙新聞使用 | | -.05 | -.06 | -.08 |
| 網路新聞使用 | | .08 | .08 | .09* |
| 媒介信任 | | | | |
| 電視新聞信任 | | | .12* | .14* |
| 報紙新聞信任 | | | .01 | -.02 |
| 網路新聞信任 | | | .01 | -.00 |

| | 模式1 | 模式2 | 模式3 | 模式4 |
|---------------------|---------------------|---------------------|---------------------|---------------------|
| 個人倫理 | | | | |
| 普世倫理1 | | | | -.15 ^{***} |
| 普世倫理2 | | | | .06 |
| 相對倫理1 | | | | .26 ^{***} |
| 相對倫理2 | | | | .08 [*] |
| 樣本數 | 1025 | 1025 | 1025 | 1025 |
| 調整過後的R ² | 0.04 | 0.04 | 0.06 | 0.7 |
| SEE | .4621 | .4614 | .4588 | .4307 |
| F值 | 9.12 ^{***} | 5.34 ^{***} | 4.64 ^{***} | 9.66 ^{***} |

說明：*** 顯著性表示 $p < .001$ ，** 顯著性表示 $p < .01$ ，* 顯著性表示 $p < .05$

媒介內容、新聞採訪與個人倫理觀

排除普世倫理2在表一和表二都未達顯著之外，本研究進一步將所有內容倫理以及新聞採訪倫理當作自變項，並將普世倫理1、相對倫理1以及相對倫理2當作依變項，試圖釐清各種內容及採訪倫理對於個人倫理觀的影響，結果發現，民眾對內容倫理項目裏「新聞使用女性裸露鏡頭」以及「新聞裏有暴力犯罪內容」兩題項的倫理標準可以預測其普世倫理觀，對「新聞使用女性裸露鏡頭」標準愈寬鬆的民眾，其普世倫理觀愈低，呈負向關係 ($\beta = -2.67$, $\alpha = .01$)，同樣，對「新聞裏有暴力犯罪內容」標準愈寬鬆的民眾，其普世倫理觀也是愈低，呈負向關係 ($\beta = -2.32$, $\alpha = .02$)。另外，在新聞採訪倫理項目裏，則是「記者為了採訪需要，可以未經過他人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資料或照片」這個題項可以預測民眾的絕對倫理，同樣呈負相關 ($\beta = -6.83$, $\alpha < .001$)。

其次，內容倫理的「新聞使用女性裸露鏡頭」以及「新聞報導很多名人的私生活」都可以預測相對倫理1這個變項，「新聞使用女性裸露鏡頭」與相對倫理1呈正相關，($\beta = 2.00$, $\alpha = .05$)，「新聞報導很多名人的私生活」與其則呈負相關 ($\beta = -2.30$, $\alpha = .02$)。而採訪倫理的「新聞使用電腦動畫模擬事件經過」、「政府花錢請記者採訪新聞」以及「記者為了

採訪需要，可以未經過他人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資料或照片」這三項皆可預測相對倫理1，也都呈正向關係(新聞使用電腦動畫模擬事件經過)($\beta=1.97, \alpha=.05$)；「政府花錢請記者採訪新聞」($\beta=2.67, \alpha=.01$)；「記者為了採訪需要，可以未經過他人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資料或照片」($\beta=4.36, \alpha<.001$)。

能夠預測相對倫理2的內容倫理變項為「新聞有暴力犯罪的詳細內容」以及新聞採訪倫理的「新聞使用電腦動畫來模擬事件發生經過」，兩者皆呈正相關，前者 $\beta=2.09, \alpha=.04$ ，後者 $\beta=2.40, \alpha=.02$ 。

網路新聞使用與電視新聞信任的影響

根據表二的迴歸分析，可以發現影響民眾對新聞採訪倫理態度的因素，除了人口變項、個人倫理觀之外，網路新聞使用時間與電視新聞信任也都有顯著意義。進一步探索，可以發現，使用網路時間會顯著影響民眾新聞採訪倫理的項目為「新聞用電腦動畫的方式來模擬事件發生經過」($\beta=2.07, \alpha=.04$)其他題項部分，網路新聞使用時間並無顯著預測力。

其次，電視新聞信任則會顯著影響民眾對於「新聞用電腦動畫的方式來模擬事件發生經過」、「新聞用真人演出事件發生經過」、「政府花錢去請記者來採訪新聞」以及「記者為了採訪需要，可以為經過他人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資料或照片」。

從上述可知，網路新聞使用時間較高者，除了對於新聞使用電腦模擬事件發生經過這類新科技再現形式擁有較高的容忍度之外，在其他媒介內容與新聞採訪手法的倫理觀並未與網路新聞使用時間較低者有明顯差異。換言之，民眾大量閱讀網路新聞並不會造成全面性的倫理觀鬆綁，但其確實會對新科技創意再現形式較為樂觀。

反觀電視新聞信任度高者，對於媒介新聞採訪的方式相對來說更為寬鬆，不只可以容忍電視台使用電腦及真人模擬演出，甚至也能接受政府花錢置入新聞以及記者未經同意使用私人文件。整體來說，對於電視新聞信任度高的民眾，在基本較普遍認知的項目，例如新聞有性犯罪、女性裸露、商業置入新聞等都擁有較高的倫理標準，然而在

某些新聞再現的手法上卻顯得十分依賴與信任組織，其中原因或許因為新聞再現手法和機密資訊蒐集都超過民眾專業，在失去尺度的情況下，民眾願意因為信任組織，進而支持電視台的所作所為。

總結與討論

綜合以上，不難發現民眾在多媒介環境下的新聞信任與倫理觀確實有其複雜與特殊之處，許多媒介表現與呈現方式在民眾眼中可能有符合或不符合倫理之處，而這些評判標準也可能因人而異，十分多元，並出現重視相對倫理或普世倫理的認知差異。

研究問題一的描述分析上可以看出受訪民眾期望媒體扮演公共服務和第四階級的守門角色，對於當下媒介新聞是否公正、可信和正確的評價略偏負面，也較同意媒介有侵犯隱私和報導較多暴力內容的傾向。和美國近年的研究發現相當類似，顯示民眾媒介倫理表現觀感不佳。

回應研究問題二，我們發現，網路的使用並不會對民眾的倫理觀有大幅度的影響，諸如色情、暴力以及隱私的部分，網路使用愈多的人和網路使用不多的人都有相似的倫理觀，但對於使用如電腦動畫等新科技再現新聞的看法，使用網路愈多的人其同意程度也愈高。這或許是因為台灣《蘋果日報》率先從網路動新聞引進動畫新聞敘事手法，使得網路使用者較為熟悉這類新聞敘事。但隨着「使用者生成內容」(user-generated content) 機制在台灣媒體的網路平台成熟和普遍，未來研究有必要就民眾是新聞的積極/消極參與者、參與方式(例如是公民記者、部落客、參與式記者等)以及與媒體互動如何影響其倫理觀進行探討。

再者，研究問題三所關心的是影響民眾對媒介內容倫理看法的因素，根據研究結果顯示，民眾個人的「普世倫理」與「相對倫理」才是關鍵，至於媒介暴露時間與新聞信任則不是影響因素。換言之，民眾對於媒介內容的倫理態度，與自身所具備之倫理觀較有關係，傾向「絕對主義」者，對媒介內容的倫理標準也較為嚴格。然而研究問題四所關心的民眾對新聞採訪倫理觀的態度，則較內容倫理看法更具多元性，研究結果發現，具有影響力的因素包含網路新聞暴露時間、電視新聞信

任以及個人倫理觀。其中如前述，民眾網路新聞使用愈多，對於電腦動畫呈現新聞內容的態度也較正向，然而網路新聞暴露時間卻不及電視新聞信任的影響力來得大，結果顯示電視新聞信任愈高者，對於電腦動畫與真人模擬事件都傾向支持態度，對於政府置入新聞以及記者有侵犯隱私的行為都傾向予以包容，顯示電視新聞信任度愈高者，對於電視新聞的採訪行為也愈採取支持或放任態度。此處本研究也發現，教育程度愈低者，對於新聞信任程度也愈高，顯見教育水平較低的民眾，較願意相信電視新聞媒體，且較無批判主流媒體的能力。

研究問題五所關心的是民眾的個人倫理觀與其媒介倫理觀之間的關聯，根據研究發現，民眾對於新聞中愈多女性裸露鏡頭與暴力犯罪內容的態度欲寬鬆者，其「普世倫理」程度愈低，而認為記者有權未經同意使用私人文件的採訪行為的民眾，其「普世倫理」也較低。換言之，普世倫理與色情、暴力和隱私等概念之間的因素較密切。

「相對倫理」與媒介內容的結果則顯示，愈認同新聞中使用女性裸露鏡頭的民眾，其「相對倫理」程度也較高，但認為報導過多名人私生活的民眾，其「相對倫理」則愈低。相對倫理與新聞採訪之間的結果則指出，愈認同新聞使用電腦動畫模擬事件、欲贊同政府置入新聞以及記者可以未經同意使用私人文件者，其「相對倫理」則愈高。整體來說，相對倫理程度高的民眾，對於裸露、電腦再現、政府置入以及隱私有較高的容忍度，也因此對於監督報導名人私生活較不熱中。這種現象可和 Cooper (2008) 發現美國民眾因為媒體內容太誇大或暴力色情太過度而流失對媒體的信任相互印證，但也可能是民眾不熟悉媒體用科技進行侵入性較高的採訪或置入的影響，因此出現看法不一的結果。

特別是我們發現，新科技的出現並不是使民眾改變倫理觀的主要因素，然而卻是使民眾對媒介多元化再現方式更包容的原因，很可能是民眾不了解新科技在新聞的應用主要應該在擴大新聞視界，並非改變新聞本質甚至新聞「事實」(Ward, 2011)。未來如果希望提升民眾在數位媒介倫理有更多反思，有必要加強民眾在媒介運用新科技處理視聽影像的媒介素養。

另外，民眾對媒介的信任度也會使其依賴與認可媒介組織的產製行為，在不涉人性基本價值之外的倫理概念之外，人們傾向將主導權

交給媒介組織，並選擇信任組織的判斷與行事。換言之，在多媒介環境下，媒體工作者專業倫理、媒介組織的倫理、與民眾的個人倫理是交織的，個人倫理幫助民眾判斷最基本的價值概念，例如性與暴力，但媒介組織倫理則必須負責關於商業置入、隱私以及再現的規範。本研究也發現，最有爭議的部分為「隱私」與「置入性新聞」的議題，民眾對於這兩者態度較為分歧。

台灣學術界長期認為新聞應該有其專業意理，然而現在新聞業卻往往是專業和市場「倫理衝突」最可能的觸發點，在此轉型拉鋸之際，本研究認為台灣民眾的媒介倫理觀確實是專業倫理與民眾個人倫理交織融合的複雜景象，且研究更進一步指出，民眾雖然仍有絕對倫理觀，但在本地的倫理難題中，包含電腦動畫模擬以及新聞置入性行銷等問題，民眾看法卻很紛歧，且以相對倫理觀高者多具正面看法。可看出外在環境的變化似乎不利於普世倫理觀的實踐，由於媒體正在重新定位自己與社會的關係，這方面的發展值得後續注意。

第三，本研究發現過往文獻操作化「普世倫理」與「相對倫理」的題項，無法與西方文獻產生一致結果，初步認為是台灣與西方民情不同，例如對於題項中「說謊」與「利益」的認知彼此不同，因此也建議未來後續相關研究可在研究方法和理論探討時，對此再做深入釐清與詮釋。

最後，西方媒介倫理研究領域已經進入以多元理論豐富與支持不同倫理觀的階段，然而台灣媒介倫理研究不但在學理探討、案例發展仍是荒蕪之地，亟須發展出更精緻深入的理論與實務之間的接合構面。Christians等(2005)探討全球媒介倫理哲學思想時，提出了倫理知識、價值、以及一元/多元論的討論，其中並特別介紹孔子的倫理觀以及儒家思想在於專業倫理知識及價值觀；余英時(2008)曾指出，「和亞里士多德一樣，孔子把美德放在社會的框架中，且他的學說不僅關注個人的教養，而且還注重對群眾的影響和控制力」(第482頁)，可知倫理並非孤立的「存己體驗」，而應透過實踐的檢驗而豐富其知識的開展與創新。許多學者(Berger, 2002; Wasserman, 2006; Rao & Wasserman, 2007; Wasserman & Rao, 2008)近年已展開從在地文化(如印度、非洲)的獨特性與西方媒介倫理觀的調和、甚至建立全球媒介倫理觀可能之探討，本研究也認為，正由於很多媒介倫理概念和西方內涵多所扞

格，使我們更有必要從自身文化的內在價值出發，探尋全球化下當代媒介倫理如何創新與重構。

本研究主要探討民眾的倫理觀及相關影響因素，但是從本質來看，媒體倫理構念的形成主要依賴實務上解決難題的經驗和判斷，未來應該承續過往研究(如羅文輝、張璿文，1997；羅文輝，1998)從事台灣媒體工作者的倫理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倫理理想與落實之間的落差與問題所在。

本研究另一項限制是偏重學理概念的探討，國外在倫理探討相當重視專業人士在案例的身體力行，尤其現在大眾文化丕變，倫理遭受多元價值挑戰，未來如能加強案例倫理推理的探討，並加上組織層面如所有權或決策者對倫理規範的認知管理，將會更有意義。

註釋

- 1 美國學者Clifford G. Christians (2005)認為1980年代開始是新聞倫理在美國新聞教育的開端與起飛的重要年代，主要由兩件重要歷史事件引起，一是MacBride 1980年報告(MacBride Report in 1980)：*Many voices, one world: Towards a new more just and more efficient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即這本攸關倫理教育的重要教科書出版；另一事件是紐約Hastings中心(Hastings Center of New York)在80年代進行美國有史以來最深入的新聞高等教育地位、問題和如何進行專業教育進行調查與探討，為倫理教育、新聞專業、人權和文化多樣的重要議題奠基。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Chinese Section)

余英時(2008)。《人文與理性的中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Yu Yingshi (2008). *Renwen yu lixing de zhongguo*. Taipei: Lianjing chubanshe.

林照真(2005)。〈「置入性行銷」：新聞與廣告倫理的雙重崩壞〉。《中華傳播學刊》，第8期，頁27-40。

Lin Zhaozhen (2005). "Zhiruxing xingxiao": *Xinwen yu guanggao lunli de shuangchong benghuai*. *Zhonghua chuanbo xuekan*, 8, 27-40.

- 許瓊文 (2009)。〈新聞記者採訪報導受害者應面對的新聞倫理：多元觀點的論證〉。《新聞學研究》，第 100 期，頁 1-55。
- Xu Qiongwen (2009). Xinwenjizhe caifang baodao shouhaizhe yingmiandui de xinwen lunli: duoyuan guandian de lunzheng. *Xinwenxue Yanjiu*, 100, 1-55.
- 徐柏棻 (2011 年 5 月 31 日)。〈可信度調查 法官排名後段班〉。《聯合報》，A2 版。
- Xu Baifen (2011.05.31). Kexindu diaocha, faguan paiminghou duanban. *Lianhebao*, pp. A2.
- 陳慧蓉 (2011)。〈台灣媒體文化的馬其維利拉扯〉，《民主視野》，第三期，2013 年 12 月 14 日取自：<http://www.lthsociety.org/index.php/2011-05-25-02-09-00/2012-03-07-07-28-16/214-2012-03-07-08-19-48>。
- Chen Huirong (2011). Taiwan meiti wenhua de maqiweili lache. *Minzhu shiye*, 3, Retrieved on 2013 December 14 from <http://www.lthsociety.org/index.php/2011-05-25-02-09-00/2012-03-07-07-28-16/214-2012-03-07-08-19-48>.
- 遠見雜誌 (2013)。〈社會信任度調查〉，2013 年 7 月號，第 325 期，2014 年 2 月 2 日取自：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23562.html。
- Yuanjian Zazhi. (2013). Shehui xinrendu diaocha, 7(352). Retrieved on February 2, 2014, from http://store.gvm.com.tw/article_content_23562.html.
- 羅文輝 (1998)。〈新聞人員與利益衝突〉。《新聞倫理再出發：來自多元價值與大眾文化的挑戰》，頁 8-16。台北：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
- Luo Wenhui (1998). Xinwen ren yuan yu li yi chong tu. In *Xinwen lunli zaichufa: Laizi duoyuan jiazhi yu dazhong wenhua de tiaozhan*, (pp. 8-16). Taipei: Guoli Zhengzhi Daxue Chuanbo Xueyuan.
- 羅文輝、張璦文 (1997)。〈台灣新聞人員的專業倫理：1994 年的調查分析〉。《新聞學研究》，55，244-271。
- Luo Wenhui, Zhang Liwen (1997). Taiwan xinwen ren yuan de zhuan ye lun li: 1994nian de diaocha fenxi. *Xinwenxue yanjiu*, 55, 244-271.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tkin, D. (1994). Newspaper reading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influence of tele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for Communication Administration*, 56(20), 95-103.
- Berger, G. (2002). Theorizing the media—democracy relationship in Southern Africa.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4(1), 21-45.
- Bivins, T. (2004). *Mixed media: Moral distinctions in advertising, public relations, and journalism*.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 Boczkowski, P. (2010). *News at work: Imitation in an age of information abundanc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k, S. (1995). *Common value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Brooks, B. S., & Kropp, R. K. (1994). *Persuading children to read: A test of electronic newspaper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ewspaper Divis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Atlanta, August.
- Callahan, S. (2003). New challenges of globalization for journalism.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18(1), 3–15.
- Centite, M., & Zhang, Y. (2011). Recommendations for hosting audience comments Based on Discourse Ethics.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5(4), 293–309.
- Cooper, T. (2008). Between the summits: What Americans think about media ethics. *Journal of Media Ethics*, 23, 15–27.
- Christians, C. G. (2001) *Media ethics: Cases and moral reasoning*. New York: Longman.
- Christians, C. G. (2005). Ethical theory in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Journalism Studies*, 6(1), 3–14.
- Christians, C. G. (2008). *Media ethics in educatio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9(4), 180–221.
- Curran, J. (2005). Mediation of democracy. In J. Curran & M. Gurevitch (Eds.), *Mass media and society* (pp. 122–149). London: Arnold.
- Day, L. A. (1991). *Ethic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Cases and controversies*. Belmont, CA: Wadsworth.
- Deuze, M. & Yeshua, D. (2001). Online journalists face new ethical dilemmas: Lessons from the Netherlands. *Journal of Mass Ethics*, 16(4), 273–292.
- Forst, C. (2000). *Media ethics and self regulation*. New York: Longman.
- Gadamer, H. G. (1996). *The enigma of health: The art of healing in a scientific 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lasser, T. L., & Ettema, J. S. (2008). Ethics and eloquence in journalism: An approach to press accountability. *Journalism Studies*, 9(4), 512–534.
- Good, H. (2003). *Desperately seeking ethics: A guide to media conduct*. Lanham, Md.: Scarecrow Press.
- Greenberg Quinlan Rosner Research survey. (2000, Oct. 2–23). Retrieved December 27, 2010, from the LexisNexis database.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 Harber, A. (2002 September 16). *Journalism in the age of the market*. Paper presented at 4th Harold Wolpe Memorial Lecture. Retrieved on 2010 April 23 from <http://www.ukzn.ac.za/CCS/default.asp?11,22,5,188>
- Habermas, J. (1990).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indery, L. (2005). *It takes a CEO: It's time to lead with integrity*. New York: Free Press.

- Ibold, H. (2010). Walter Williams, country editor and global journalist: Pastoral exceptionalism and global journalism ethics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5(3), 207–225.
- Keane, J. (2005).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across borders. In G. Overholser, & K. H. Jamieson (Eds.), *The Press* (pp. 92–114).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beth, E. B. (1992). *Committed journalism: An ethic for the profess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Lambeth, E. B. (1998). Does civic journalism have a future? In M. Salvador & P. Sias (Eds.), *The public voice in a democracy at risk: Citize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pp. 115–126). Westport, CT: Praeger.
- Lambeth, E. B. (2000). Pragmatic liberalism and the press in violent times. In R. Cohen-Almagor (Ed.),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tolerance: Essays in honor and memory of Yitzhak Rabin* (pp. 232–250).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ambeth, E. B., Meyer, P. E., & Thorson, E. (Eds.). (1998). *Assessing public journalism*. Columbia, MO: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 Meyer, P. (1987). *Ethical journalism*. New York: Longman.
- Merrill, J. C. (1996) Merrill: Journalism is not a profession. In E. E. Dennis, & J. C. Merrill (Eds.), *Media debates: Issu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2nd ed.).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 Paulson, K. (2002). 'Too Free?', *American Journalism Review*. Retrieved on November 8, 2013, from <http://ajrarchive.org/article.asp?id=2621>,
- Plaisance, P. L. (2007). An assessment of media ethics education: Course content and the values and ethical ideologies of media ethics students.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61(4), 378–396.
- Rao, S., & Wasserman, H. (2007). Global media ethics revisited: A postcolonial Critique. *Global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1), 29–50.
- Renen, T. (2000). *Journalistiek al seen kwe2006*. *stie van bronnen* [Journalism as a matter of sources]. Delft, The Netherlands: Eburon.
- Retief, J. (2002). *Media ethics: An introduction to responsible journalism*.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ichard, K. (2009). *Ethics for journalists*. New York : Routledge.
- Siebert, F. S., Peterson, T., & Schramm, W. (1974).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pence, E. H., & Quinn, A. (2008). Information ethics as a guide for new media.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3(4), 264–279.
- Ward, S. J. A., & Wasserman, H. (2010). Toward an open ethics: Implications of newmedia platforms for global ethics discourse. *Journal of Mass Media Ethics*, 25(4), 275–292.
- Ward, S. J. A. (2011). *Ethics and the media: An introdu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asserman, H. (2006). Globalized values and postcolonial responses: South African

- perspectives on normative media ethic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azette*, 68(1), 71–91.
- Wasserman, H., & Rao, S. (2008). The glocalization of journalism ethics. *Journalism*, 9(2), 163–181.
- White, R. A. (1995). From codes of ethics to public cultural truth: A systemic view of communication ethic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0(4), 441–459.
- Wilkins, L. (2010). Connection care and duty: How neuroscience and feminist ethic can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professional moral development. In S. J. A. Ward, & H. Wasserman. (Eds.), *Media ethics beyond borders: A global perspective* (pp. 24–41). New York: Routledge.
- Wilkins, L., & Christians, C. G. (2009). *The handbook of mass media ethics*. New York: Routledge.
- Yao, Q. J., & Eigenmann, C. S. (2013). Building a coordinate system: An eth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media coverage of disasters. *American Communication Journal*, 15(2), 1–16.

本文引用格式

徐孟延、蘇蘅 (2015)。〈多媒介時代的新聞與倫理：台灣民眾新聞使用、媒介信任與倫理觀的關聯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33期，頁225–254。